

壮语文化论

韦达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壮语文化论

韦 达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壮语文化论 / 韦达著. —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6. 4

ISBN 7 - 5363 - 5126 - 7

I. 壮... II. 韦... III. 壮语—研究 IV. H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3578 号

ZHUANGYU WENHUA LUN

壮语文化论

韦 达 著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地址 南宁市桂春路3号 邮政编码 530028)
发行电话	(0771)5523216 5523226 传 真 (0771)5523246
E-mail	CR@gxmzbook.cn
责任编辑	尹福建
封面设计	林武圣
责任校对	韦彩娟
责任印制	蓝剑凤
印 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
规 格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70千
版 次	200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3-5126-7/C·254

定价: 1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771)5523216



作者简介

韦建，壮族，广西武鸣县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中国文学学会会员，广西民族研究学会理事，广西民族语言学会理事。

1963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壮族语言文学专业，师从马学良、张元生等著名语言学家。毕业后曾到部队锻炼，体验生活，在宁明县的县委、宁明中学和广西民族干校工作。1983年，由广西区民委调到广西民族学院创办壮族语言文学专业，任教研室主任。

从事大学教学工作以来，先后开设过《汉壮翻译理论与实践》、《文化语言学》等6门课程。公开出版的独立合作的著作有《汉壮翻译理论与技巧》、《壮语概论》等10部。在国内外发表的语言论文有《THEM TIEN TO, HAO TO-MOT PHUONG DHAP CAU TAO DONG TU TIENG CHUANG》（越南）、《壮语动词的前冠后附构词法》（《民族语文》）、《壮族称谓音义探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壮语使用中的语法规范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等近50篇。曾完成过国家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关于培养教师壮汉双语能力，提高壮族地区初中教学质量的研究》和本院的多个重点科研项目，并荣获教育部、广西教育厅、广西高校等多个奖项。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1)
一、语言文化研究的肇端	(1)
二、语言文化研究的现状	(3)
三、语言文化研究的前景	(6)
第二章 壮语概述	(11)
一、壮语的特点	(11)
二、壮语研究	(19)
第三章 壮族传统文化概貌	(38)
一、物质文化	(38)
二、制度文化	(41)
三、观念文化	(48)
第四章 普通词汇与感情、道德伦理	(54)
一、形容词、动词隐含着壮族细腻的感情	(54)
二、具体词体现壮族直观的思维方式	(57)
三、合成词反映壮民等级的道德伦理观念	(59)
第五章 成语与自然、社会环境	(62)
一、壮族社会的山川物产特点	(62)
二、宗教信仰重佛道教轻基督教	(65)
三、勤俭修身的生活信条	(66)
四、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	(68)
第六章 谚语与人生经验	(70)
一、做人原则	(70)
二、治家之道	(72)
三、农事经验	(75)
四、价值取向	(77)

第七章 歇后语与幽默性格	(79)
一、曲线的表达	(79)
二、故意卖关子	(81)
三、善意的挖苦	(82)
第八章 称谓与壮族精神文明	(85)
一、称谓的类型	(85)
二、关爱幼小	(87)
三、崇尚母性	(89)
四、尊重长者	(90)
五、宽厚待人	(92)
附 壮语亲属称谓表	(93)
第九章 地名与历史	(96)
一、壮语地名的命名特征	(96)
二、从壮语地名窥见壮族先民早期分布的地域	(99)
三、从壮语地名推知壮族社会生活的特点	(102)
附 地名要览	(105)
第十章 族称音义与民族辨正	(108)
一、百越和于越	(109)
二、僚和俚	(111)
三、僮和蛮	(113)
第十一章 古壮字与民族文化心理	(116)
一、壮族创制本族文字的民族心理	(116)
二、壮汉文化共生共荣的密切关系	(119)
三、壮族古壮字的文化价值	(121)
第十二章 汉借词与民族文化交流	(125)
一、汉借词的借入渠道	(125)
二、汉借词的引入方式	(129)
三、壮借汉的文化心理	(130)
四、壮汉文化交流的记录	(133)
第十三章 语音与审美观念	(136)
一、双音节、节拍反映出来的对称美	(136)

二、双声叠韵、平仄反映出来的和谐美	(139)
三、声调、歌韵反映出来的曲折美	(142)
第十四章 语法结构与思维方式	(147)
一、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147)
二、语法结构反映的思维方式	(148)
第十五章 修辞与表达效果	(157)
一、修辞的概念	(157)
二、修辞与语言、逻辑规则	(157)
三、常规修辞	(159)
四、超常修辞	(166)
第十六章 壮语与汉方言及其文化蕴意	(173)
一、“四话”的共同特征	(173)
二、壮汉语言认同	(178)
三、壮汉民族互融共荣	(179)
四、互利共赢是民族发展的方向	(181)
参考文献	(183)
后记	(186)

第一章 总论

一、语言文化研究的肇端

将语言与文化相结合而进行的研究，并非肇始于今日。在我国汉语的传统语文学中，以训诂为中心的小学研究，早就与古代的汉族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了。汉语的小学研究，是以“通经致用”为宗旨，为目的，也就是为了帮助人们阅读古典文献，解决人们所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提高阅读能力和做文章服务的。这种研究，它从语言去研究古代的文献，这就势必与经典中的历史、文学、哲学、风俗等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是血肉交融的。小学研究的训诂、音韵、文字三部分中的训诂学，它注重研究汉魏以前古书中的词义，历史最为悠久。它在先秦前就开始萌芽，在两汉时正式形成一门学问。众所周知的《尔雅》，它本是公元前 770 年春秋时代以后经学家们记录解释古籍经传中的词语的，在一代一代的相传中，由于各都有些增益，至西汉初年才被学者们加工整理而成一部解释词义的专书。小学研究，到隋唐时期，没有什么发展，处于保守时期；到宋代，它虽然有所革新，但发展也不很大；到元朝明朝时代，它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出现一些衰退现象；清代开始，它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尤其是清朝乾嘉时期，语言与考据均臻顶峰的地步，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诸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出现了一批语言学家。著名的如顾炎武，他写了《日知录》、《音学五书》、《韵补正》等著作；戴震是经学、音韵学家江永的弟子，他著有《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钱大昕，他没有专门的著作，但他的音韵学的主张颇多创见，散见于《潜学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之中；段玉裁，他花了 30 年时间著成《说文解字注》，此书学术价值极高，是研究文字训诂学的重要参考书；王念孙，他也曾花 10 年时间，“殚精竭虑”，完成一部《广雅疏证》，他学识深厚，学风严谨，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段玉裁也

是);王引之,王念孙之子,他继承父业,写有《经传释词》、《经义述闻》等书;俞樾,他是章炳麟的老师,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书;马建忠,著有《马氏文通》(1898),这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是划时代的书。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语言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清末发现甲骨文以后,20世纪初期,有的学者开始以甲骨文作为材料,来研究中国的历史,代表人物是孙诒让、王国维、梁启超。梁启超第一个提出了“语原”,即语言文字反映社会文化的理论。这之后,不少人也从文字或古文字来考证古代社会,其范围涉及人形、货币、家宅演进、妇女、家族制度、部族、官吏、刑法、道德观念等文化方面。其中研究成就最高的是郭沫若,他用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为材料,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于1930年出版了两部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文字研究也是语言文化研究,但它还不是直接的,真正把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个人是樊中,他于1925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由言语上研究古代文化》的论文,自此后,类似的研究热闹了起来,如高本汉的《语言学与古中国》;魏建功的《语言与中国纯文学》;罗常培的《语言与少数民族文化》;张东荪的《语言构造与中国哲学》;高华年的《借词与中国文化传播》;张清常的《语言与音乐》、《文学关系》;高名凯的《汉语与思想表达、心理趋势》等等的研究。这个时期影响较大的是郭绍虞和罗常培,郭氏连续发表了《中国诗歌中之双声叠韵》、《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等论文,最后都吸入了《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之中。罗常培除了发表不少散章的论文外,还公开出版了《语言与文化》(1950年)一部专著,这部专著是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它真正地从事语言的角度去论述语言与文化的种种关系。该书虽然篇幅不长,也未能详细地展开来阐述,但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把它当做范本来学习。值得提到的是,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不仅语言学家做了,民族学家也早就做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一些民族学家在对社会做实地调查中,同时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在他们公开出版的重要著作中,都有不少的语言学的内容,如徐松石的《泰族壮族粤族考》、《粤江流域人民史》,刘锡蕃的《岭表纪蛮》等著作,里面就记录了不少壮族语言的资料。以上是我国的研究情况。在国外,把语

言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约于19世纪上半叶开始。德国语言学家W. V. 洪堡特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论文,第一次提出并研究了语言结构与人类精神的关系。20世纪初,美国的人类学家F. 鲍阿斯、A. C. 克虏伯、E. 萨丕尔、B. L. 沃尔夫等,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与社会进行了认真广泛的调查,并创立了一门新科学——人类语言学。继他们之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B. 马林诺夫也曾在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群岛上调查、研究土著的语言与社会问题。在此之后,还有西方的一些学者利用人类语言学的方法分析过诸如亲属结构等等的问题。外国学者把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也始于20世纪初期,他们基本上是一些汉学专家。例如法国的M. 格拉内、H. 马伯乐和美国的B. 劳佛,他们发表了多种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论著。但他们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法国学者研究的重点是汉语和汉人思维、逻辑的关系,试图用汉语言的特点来证明汉族人心智的特殊性,而美国学者劳佛,则侧重收集了有关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的论文材料。从总的来看,外国学者的研究缺乏理论阐述,堆砌材料的多,研究不甚成系统。

二、语言文化研究的现状

(一)文化语言学产生的背景。

“文化语言学”是新生的学科名称,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在杂志刊物上出现。是时,我国的国策有重大的改变,国内出现了大好的形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学术自由的气氛加浓,文化热很快席卷全国。伴随着学术界的文化热,语言学界也出现了新的气象,产生了文化语言学。

文化语言学的产生,是语言学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前面说过,我国的语言研究,很早就与文化结合起来了,有悠久的历史,但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30多年中,由于受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这一阶段的语言研究、语言结构的描写成为了主流,而结构语言学本身的弊端不少。首先,它的指导思想不正确,它只重视对语言形式的描写,分析语言本身的内部结构,而语言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

密切联系则忽略了,这就使语言学的应用、实用价值降低。另外,结构语言学照搬硬套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如分析语法时选用的几套句子分析框架,使用的整套的基本语法范畴等,基本上是移用西方语言学的那一套。这就脱离了我国语言事实,使语言研究越来越萎缩,出现了“语法学的困惑”。这不仅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而且对语言的研究产生严重影响。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全国文化热的影响下,在我国的语言学研究经过长期的纯语言研究的洗礼以后,人们感觉到我国的语言学研究,不能只有一个模式,而应该充分吸收各门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如现代语言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来丰富语言研究的理论方法,还要继承语言科学研究中科学的好的东西,如我国传统的小学研究,特别是训诂学的研究。从它们身上吸取营养,使语言研究的根扎在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土壤之中,拓宽语言研究路子,推动语言学研究深入开展。文化语言学由此应世而生。

文化语言学的产生,是因为语言本身就蕴含着文化。我们知道,语言,包括文字,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产生于社会之中,它的变化发展也受到社会以及文化、人文地理的影响,社会与语言形成一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这是语言蕴含文化的一个方面。另外,语言是交际工具,语言文字的使用附有使用人的文化特点,例如民族的、阶级的、地区的、家庭的、个人的等各种特点,这些文化特点又影响使用人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而且语言文字的功能的变化,如缩小、扩大、消失,都受到社会的制约,社会需要它,它就存在,反之,它就消亡。还有,语言系统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它隐含着人类创造语言的明显的意识或潜在的意识,这种意识分布在语言的结构之中。人们研究语言,自然就要发掘它本身蕴含的文化因素,这就促使文化语言学的诞生。

(二)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成果。

文化语言学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以后,就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不少专家学者特别是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的中青年学者,以极大的热情和大大的气魄,投入到这个研究领域中来,仅短短的几年时间,便出现了人才辈出、果实累累的喜人局面。例如《方言与中国文化》(游汝杰)——《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语言文

化社会初探》(陈建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中国句型文化》——东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语言与文化》(邓炎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文化社会学》(司马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文化语言学》(邢福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文化的镜象——人名》(王建华)——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文化的撞击——语言交往》(姚亚平)——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简论汉字文化学》——《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汉语人文性思想三题议》——《北方论丛》,1990年第一期;《汉语人文精神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语言与社会生活》——1979年;《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年;《社会语言学教程》(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年;《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1988年;《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1989年;《汉语词汇与文化》(常敬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杨林)——语文出版社,1996年;《汉语与文化交际》(杨德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汉语熟语与中国人文世界》(崔希亮)——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跨文化交际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等等。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1980年以后也进入了这一领域。早进入的是游汝杰的《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论文,随后的著述也接连不断,如《文化语言学发凡》(张公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汉傣语言文化论》(王渝光、单春樱、崔梅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达翰尔语言文化与社会文化》(丁石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史有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侗台语言与文化》(李锦芳)——民族出版社,2002年。等等。

(三)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特点。

文化语言学成长在中国的肥沃土地上,它的文化背景是非常深厚的,因此,它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1. 继承传统。前面说过,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那就是小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语言与文化的结合研究,它并不是丢开传统,完全另搞一套,它还是注意运用传

统的研究方法,认真吸收传统研究的养分,根深扎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化研究之中。对于历史语言研究、结构语言研究等,也不是全盘否定,彻底排斥,成功的经验、有用的方法还是积极采用的,注意继承性的。

2. 创新意识强。投身于文化语言学热的专家学者们,他们各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抛弃旧的不适于现代社会的语言观念,都试图建构起新的研究体系。如在划分流派上,邵敬敏根据研究者在理论、原则、方法上的不同,把中国文化语言学分为三大流派:双向交叉语言学(代表人物游汝杰)、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代表人物陈建民)、全面认同语言学(代表人物申小龙)。邢福义等则根据研究者的理论主张、研究目的和具体研究成果,把中国文化语言学分为这样的三派:关系参照派、本体认同派、交际教学派。很明显,他们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创新意识,都力图创造一样新的东西。从总体看,各家所提的三个流派的范围基本相同,但对它的特点与作用的评价不怎么一致,有分歧,尚待进一步研讨才能统一。

3. 涉及面宽。这些年来文化语言研究成果,给人们的印象是目不暇接。它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在语言层面,它涵盖到语音、语法、词汇、文化、修辞、方言、语体、教学、翻译等;文化层面,它包括到哲学、政治、经济、心理、宗教、考古、民族、历史、地理、文学艺术、音乐戏剧、民俗、神话传说等等。多角度、全方位地切入是我国语言研究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4. 研究方法多样。因为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学科,涉及范围广,所以,它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只限语言学方法,还有文化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等等。一般学者都采用的方法有实地调查研究法、对比研究法、文化结构分析法、文化心理分析法、数学分析法等等。在本课题的研究中,我们也综合地采用了这些研究方法。

三、语言文化研究的前景

我国的文化语言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仅十多二十年,时间的短暂,无法促成理论马上成熟,方法立即完善;加上研究人员

尚未形成庞大队伍,各人的认识也不怎么一致,因此,研究的步履还相当艰难,学科的成长稍微缓慢。但是,语言文化的研究风气已蔚然成风,研究势头有增无减,不可阻挡,将要研究的课题也非常广泛,其前景是光明的。就壮语文化来说,下面的这些方面都可以作为研究的内容。

(一)心理特征。

壮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民族心理,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这些倾向性在心理内容的某些方面表现明显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总是在言语上时时处处反映出来。壮族人处事时习惯于调和折中,不偏不倚,谨守本分,免罪于人,在言语上表现出来的中庸观念非常明显。自己的成绩非常突出、优秀,但在评优评奖会上,却说“θui³ piŋ² kou¹ tam⁵, kai³ piŋ² kou¹ lo⁶”,不敢出头冒尖,接受荣誉;有客人到家里来,明明做了很多菜肴,但却说“bou³ mi² pjak⁷ ma², men⁶ kuan¹ nu⁶!”这是一种病态的过分谦虚,并不是什么“含蓄”、“委婉”,人们要理解它,只能从中庸的背景中去了解,从修辞中是无法得到满意的解释的。壮族人在进行精神活动时,把“tuŋ⁴(肚)”看成是思维的器官,把人的头脑聪明说成,“tuŋ⁴ man⁶(肚聪明)”,把心情紧张说成“tuŋ⁴ bau⁵(肚惊慌)”,把愚蠢说成“tuŋ⁴ lat⁷(肚蠢笨)”,把会思考说成“tuŋ⁴ ɣo⁴ ŋva; n⁶(肚子会想)”,这也是壮族人的特别的心理特征。我们还可以从语言中的词义的褒贬去研究各地方人群的心态。如 kop⁷(青蛙),在壮族的一些地方,对“kop⁷”有好感,把“kop⁷”当做图腾来崇拜,为“kop⁷”过节,“kop⁷”是个褒义词;而一些地方则把“kop⁷”看成是愚笨的动物,骂人时,说那个人是 kop⁷, kop⁷ 是贬义词。词义的褒贬折射出不同人群的心态。

(二)价值观念。

由于民族思想、文化、观念、出身、阅历性别等的不同,人们对事物的评价标准就不同。在语言上也可以找到它的踪迹。例如汉族的男尊女卑的价值观非常根深蒂固,汉字“妒、妖、嫉、婪、妄、嫖、奸、妍、嫖”的

结构都是“女”字偏旁,就是把“女”人看成是坏的东西,极力贬低女性。我们从一些壮语语序的排列上也可以看到这一点。男女词语一起出现时,总把男性排在前头,把女性排在后面。如:θa:i¹ buk⁷、kva:n¹ pa²、

男 女 夫 妻

ta⁴ po⁶ ta⁴ me⁶、luk⁸ ba:u⁵ luk⁸ θa:u¹、po⁶ luŋ² me⁶ pa³、tak⁸ a:u¹

父 母 男 孩 女 孩 伯 父 伯 母 叔 叔

mc⁶ θim³、po⁶ kou¹ me⁶ kim⁴等。壮语中有ja⁸ no:i¹(小老婆)这个词,却没有

媯 母 舅 父 舅 母 妻 少

有kva:n¹ no:i¹(小丈夫)这个词,有cim¹ ja⁸(相妻子),却没有cim¹ kva:n¹

丈夫少 凝视妻 凝视丈夫

(相丈夫),反映出了男权女附的社会状况。还有诸如谚语、山歌、其他文化词语等等都直接地展示出一个民族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

(三) 婚姻家庭。

壮族在历史上盛行早婚,但男女婚姻还比较自由,其婚制、婚仪、婚俗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我们从语言中的词语可以找到。例如 tai³ ha⁵(哭嫁)这个词就是反映出了壮族的婚俗特点。壮族女青年在结婚的前一天晚上,都要和女伴们聚在自己的房中相叙,并唱哭嫁歌,叙述对父母、弟妹和同伴依恋之情。cim¹ ja⁸(相妻)是一种婚仪,媒人让男方躲在某地方 cim¹(凝视)女方,看女方的长相、身材怎么样,若满意就是把婚定下来,若不满意,就了事,女方完全不知道男方在“窥视”她。从这个词可以看出,壮族的男性在婚姻问题上处于“尊”地位,女性处于“卑”、“附”的地位。我们还可以从“au¹ 娶”和“ha⁵ 嫁”这两个字在语言的对立上,看到壮民族的婚姻观念:“结婚就是男人从女方家中要一个女人回家来,由自己占有;女方家抚养女儿成人后就得送给别人,家庭中失去一个成员。”家庭在壮族地区来说,一般是实行父系的小家庭制。在壮族家庭中,女儿始终处于从属的位置,她们不仅不能作为家庭财产的继承人,连自己的零用钱和嫁妆钱都得靠自己积攒。壮语里的一个词“ci:n² ɣai¹”,意思是指姑娘靠自身的劳动收入而积攒的钱。姑娘的这种劳动是额外的劳动,如自己砍柴打草去卖,或者自己养猪、开荒种地等不参加父母的大田的那种劳动。唯有这种劳动的收入才能归自己。家庭的宗族观念、亲属关系、姓氏等等问题也都在语言中打上烙印。

(四) 宗教信仰。

宗教属于观念文化,它与政治、法律、哲学等一样,也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壮族宗教产生以后,语言中也就随着产生了宗教内容的、宗教仪式的词语。因此,我们说,宗教与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壮族的宗教信仰如何,从语言中去观察研究,都可以找到它的蛛丝马迹。

(五) 民族关系。

广西境内有 12 个民族,而人口最多的是壮族和汉族。壮族是土著民族,汉族是“客”来民族。在交流来往过程中,壮族从汉族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经验;汉族人也从本土民族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双方互学互帮,共同发展,形成和睦、团结、融洽的民族关系。这种关系,在语言上有很多的表现,只要我们作深入的研究,都会从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壮族人借用汉语及其方言粤语的词语、句型,反映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汉语及其方言中含有不少的壮语词语,则反映了本地文化对外来民族的影响。

(六) 方言建制。

建制就是行政区划的制度。方言与行政区划有密切的关系。壮族之所以有两大方言、十三个土语,除地理环境的原因外,还与历史上的行政建制有关。历史上的州、府、郡(或县、乡、村)级行政单位,由于它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的一体化而促使方言趋于一致。行政单位变动,方言就会出现变化,或者分化。我们通过研究建制沿革的名称、地理分布、政策性的语言表述,就可以了解到壮族的社会状况以及早期的社会制度等等。

(七) 生活习俗。

语言是民俗的信息载体。壮语中的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或者一席话,很可能就讲述着一宗民俗象事,如“ $\theta ei^5 \quad \eta i: t^8 \quad pe: t^7, \quad va: i^2$
四 月 八 牛
 $tu: t^7 \quad e: k^7$ ”(四月初八,脱下牛轭)。为什么四月初八要脱下牛轭?

脱 轭
原来这是壮族一些地区的牛魂节。这一天,人们都不役牛,都用枫树叶煮水,蒸糯米饭,用来喂牛,给牛过节。有的一个词就是来自民俗的,如 $to^4 ko^1, to^4 ko^1$ 跟汉语的“打平伙”的意思一样,壮族人为什么喜欢凑钱来聚餐?它反映的是壮族古代遗传下来的一种风俗,是古

代“平均主义”的遗风。语言，它是人类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民俗又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就可以了解民俗文化，反之，我们从民俗文化中也能够探索到语言的发展和变化。

(八)表达习惯。

壮族的内部成员可以分成不同的群体，若按所属成员的各种特征来划分，按年龄，可分老和少；按性别，可分男和女；按经济地位，可分阶级；按职业，可分行业。不同特征的人，他们语言的表达习惯都有一定的差异。不同年龄的人讲话时，中老年人习惯运用地道的壮语词，如“菜”讲 *plak⁷*，声母是复辅音，而年轻人却讲 *pak⁷*，声母不是复辅音；借汉语词时，中老年人讲 *θa:i⁵*（菜），年轻人却讲 *tɕa:i⁵*。不同性别的人讲话，男性往往比较开放，喜欢运用新的词语或者句型，女性则比较保守，习惯运用原有的词语和句型。阶级、行业等的不同也造成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这些表达习惯差异的现象，我们一般都可以在社会、心理、文化、生理等因素上得到解释。

上述的八个方面，是着重涉及的问题，随着传统文化寻根热的深入发展，文化语言学所要研究的课题还很多，不但在内容上要开拓高层次的领域，研究方法上也要有所更新。

今天，历史已经步入了 21 世纪，语言学也将走向新的时代。世界文化格局多中心、多元化，语言学也将是如此。我们说文化语言学的前景光明，并不排斥其他语言学科的前景。过去的历史比较研究，语言结构分析，转换生成的试验，还有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等等，有的虽然有欠缺之处，但都可以各行其道，继续深入开展，整个语言学的前景都将无限美好。语言学将走出以往的被冷待的角落，登上显著的位置，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造福于人类。